

杜润生经济思想初探

■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文集》第69页)。要搞好区域开发战略规划(《文集》第323页)。这实际就是杜老对区域问题的初步认识。

要规划建设商品粮基地、专业基地。杜老认为,粮食生产的一个大问题是搞好区域配置,必须考虑到不同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按一定区域实行平衡,根据区域分布情况,设置商品粮生产基地,注意配置最短运输距离。“建立商品粮基地,实现地区平衡、区际平衡是必要的。”(《文集》第361页)发达地区要建立一批出口商品基地,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和津京唐地区,应面向国际市场,逐渐建立贸工农的产业结构,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外贸出口,带动农产品加工和农林牧渔生产,促进农村经济商品化现代化。我国制造业有了巨大的发展,生产分工和专业化过程,必将提高。

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中央应当制定区域开发政策,地方执行区域政策必须和市场化改革政策协调起来,而且应该将改革开放政策放在主导地位。

4.关于温州经济和山西经济
杜老论述具体区域经济的文章不多,主要谈到的就是浙江省温州市和山西省。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瞭望周刊》发表过《温州行》系列文章,“温州模式”影响很大。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杜老也对温州经济给予高度关注。而山西是中国典型的资源经济区域,又是杜老的家乡,家乡经济的好坏也牵动着杜老,杜老的家乡情怀自然反映在他关于山西区域经济的文献中。

杜老写的《温州经济是老百姓经济》(1997年)和《解读温州经济模式》(2000年)明确认为,温州经济就是温州老百姓带着过去闯市场的经验,又受当时市场机制推动,从家庭手工业起步,“拾遗补缺”制造小商品,占领大市场。他认为,温州经济是民有、民营、民享,是自发的、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温州经济的主力是中小企业,必须面向未来,面向国际市场,为此要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来自创新。这个思想与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创新驱动战略是一致的。

杜老写的《山西经济》(1997年)和《解读山西经济模式》(2000年)明确认为,山西并不保守。明清初,晋商兴起,由农转商,由本地到外地,尤其是由商业转而开办票号、钱庄,给商业远距离经营提供了资金流动之便,这是一个大飞跃。进入二十世纪,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状态,晋商停止创新,造成历史转折。现在山西经济不景气,要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中小企业。山西水资源奇缺,必须从黄河调水。要扩大整个引黄的成果,向全流域的治理进军,要有大黄河、大流域的概念,不能光有山西的概念(《文集》第1437页)。可见,杜老对山西经济的分析很全面。另外,他心中还有大河流域概念,就是流域经济的发展问题。

(三)生态经济思想

杜老于1980年11月28日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工业农业要联合起来,才有利于生物的自然循环,来自自然,归还自然。这里,既有生态经济思想,也有循环经济的含义。可以说,杜老在负责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工作后,就已经高度注意生态经济方面的问题了。其原因是,农业经济与生态经济紧密联系,生态保护刻不容缓。他在2004年12月18日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大会上说,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生态弱国。由此可见,杜老到九十多岁时还能表达出这样的思想,他的生态经济观也始终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理论,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

1.保护生态环境是硬道理
杜老认为,“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山林资源,使土地得到合理利用。”(《文集》第55页)他认为,我们不能只讲经济目标,同时要兼顾生态目标。林业问题在中国是个大问题,它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的经济问题。没有森林,就破坏了生物圈的循环,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要防止水污染,把污水变成毒水,还起坏作用。一切企业如果污染环境便是自毁长城。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更要注意对环境的保护,不要先污染后治理,而是一开始就不让它成为污染源。山区是我国主要的“生态源”,必须维持它的生态平

衡。要重视草原建设及其生态环境的保护。杜老告诫我们,生态一旦遭受破坏,贻害万世,往往无法恢复。要避免滥耕滥垦滥伐滥捕滥捞,否则会造成生态灾难。保护环境要发挥经济政策的作用,从改革市场价格入手,使价格能包括生态成本,应该把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作为经济建设的一个政策导向,恰当安排国家财政投入,引导民间投资,使两者得到相互促进。保护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科学家共同努力。“发展经济决不能以破坏环境安全为代价”(《文集》第1321页)。

2.要发展生态农业、绿色农业
以生态经济思想为指导发展农业经济是杜老的重要思想。他说:“有一种主张,叫有机农业,不主张运用化肥、农药,而靠自然界生物循环转化,强调用生物、农学知识。这种主张有很多合理因素,必须重视吸收。”“我赞成重视生物措施,如育种、轮作、倒茬、施有机肥,并提倡农林牧结合,收能量互补之效等。”“有机物质多了,返还土地的自然物质增加,土壤肥力也随之改善。”(《文集》第68页)他还提出养殖业的循环发展:“利用微生物工程,同时养蚯蚓、搞沼气池,形成可以循环利用的食物链,这是一种可能现实的设想。”(《文集》第230页)他说:“终究人类还将通过农业取得再生能源,取得食品和药物原料及其他各种可贵的有机物料。可以肯定,种植业、养殖业,再加上科学加工,将形成一个崭新产业,它的规模和产值将大大增加。农业无废物的时代将加速到来。”(《文集》第243页)杜老还提倡建立节水型农业,因为水是稀缺资源。牧区要以牧为主,保护现有草场的生产能力,控制畜群数量,反对毁草种粮,防止沙化。要重视培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多生产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当代农业的发展,必须服从保护环境的要求,坚持绿色改革。要绿色GDP,不要黑色GDP。

3.要讲生态效益
“效益有两种,一是经济效益,一是生态效益。不能光讲经济效益,不讲生态效益。生态效益是一种长期效益,关系后代利益,时间管得长,管几百年、几万年。要保证我们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社会持续效益”(《文集》第90页)“在经济发达时,生态效益将是首位的目标,工业越发达,城市越扩大,生活环境受到污染,就越觉得农村之可贵。”(《文集》第269页)杜老强调,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找出各种好办法来节约和替代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这也是提高生态效益的一个办法。牧区的发展也要注意经济增长、社会安定、生态平衡三方面的综合效益。山区经济涉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关系到国家的大问题。

4.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质上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及相互制约的历史。杜老倡导按自然规律办事,要“善待天地山河”(《文集》第1262页)。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急剧增加,人类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人类改造自然、影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想日益增强,把自然界逐步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肆无忌惮地掠夺式开发利用,同时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无底的垃圾箱,毫无反顾地向其排放废水、废渣、废气。对此,杜老认为,“当人口增加,抵消了生产的增长时,又去山地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从而引起生态环境的不利变化。”(《文集》第67页)“农用地减少,人口增加,难以达到动态平衡,耕地赤字不断出现。”(《文集》第1280页)这会导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一种不和谐的状态。都市要保留一定的绿地,包括园林绿地,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成为都市的“天窗”和“肺脏”。“必须控制人口,保护耕地,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开发人力资本,科技兴国,大大降低自然资本的消耗,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文集》第1396页)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四)民营经济思想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更是我国自主创新的主力军。民营经济的主体是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原来叫社队企业。上世纪八十年代,杜老就倡导发展社队企业,要发展“小而专”“专而精”的企业,要发展就地取材,就地加工的企业。他认为,“乡镇企业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广阔发展前途的,因为它是农民的需要,经济发展的需要。”(《文集》第337页)
民营经济是民有民营民受益的经济。杜老认为,民营经济是以民为本,自力更生,自己创业,自己经营,自己发展,产权明晰,在经济激励、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具有很强的创业能力。民营经济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它产权多样化,资本社会化,可以吸引大量公民参与,体现机会平等,提高资本运作能力。政府应转变功能,理顺与企业间的关系,专事审批、管理转向提供服务,立规矩、立规章,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从政策上支持民营经济。
关于民营经济的好处。杜老认为,“凡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经济活跃、市场繁荣、人民富裕、社会稳定,呈现出勃勃生机。民营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快企业发展要靠民营经济,政府增加税收要靠民营经济,个人家庭的富裕也要靠民营经济。”
要重视发展中小企业。杜老认为,中小企业是吸引群众参与建设事业的有效形式,它有助于缓解社会两极分化趋势。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从我国资源禀赋条件看,资本稀缺,劳动力富余。大企业资本高度密集,使用资本较多而提供就业岗位较少。过多地集中有限的稀缺资源发展大型企业,以牺牲中小企业发展为代价,必然引起市场供求失衡。而在缺乏预算约束的条件下,还会引发重复建设,复制无效益、低效益企业,浪费稀缺资源,由短缺经济变成不适应社会需求的过剩经济。
中小企业是重要的创新力量。杜老说,“中小企业不仅是一种经济力量,还是一支创新的力量。”(《文集》第1037页)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对市场需求反应最灵敏,适应市场需求进行创新的愿望最强烈,与创新是天然的盟友。世界上很多新技术是由中小企业搞出来的。

(五)市场经济思想
从杜老主持制定的“五个一号文件”看,渗透着若干市场经济思想。杜老在党的十四大后经常说,我国恢复了市场经济。那么可以说我国在建国初期实行的就是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杜老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从建国初就已经开始。为推动农村改革,他又继续进行市场经济的探索。为了分析杜老的市场经济思想,需要对杜老的市场经济思想脉络作简单回顾。

1980年,杜老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五十年代,我们国家为了改造农业,同时为了限制资本主义活动,把农民和工业的关系、市场的关系暂时中断了。现在要恢复市场,农民不能只务农。”(《文集》第19页)1981年,杜老在向中央上报的一份考察报告中说:“除了积极发展集体的多种经营外,可以扩大一点自留地,多吸收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让他们搞密集劳动型的经营,增加收入,也满足市场需求。”(《文集》第26页)不久,杜老还说“发展商品经济”,“把整个自然经济的一个前提。只有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改变为商品经济,才能使生产力得到发展。”“我们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下的商品经济。”(《文集》第36页)“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当前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疏通商品流通渠道。”(《文集》第39页)“专业化生产发展起来后,就必然要和社会协作,在自愿互利基础上联合,形成社会化的生产。”“要重视的,是把发展起来的产品变为商品,不使它成为废品。”

从“恢复市场→市场需求→商品经济→社会化的生产”这个过程看,杜老把“市场”看成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因此,他坚决反对“一刀切”,给群众“自主权”。“一刀切”切得资源浪费——“什么事情从北京定一个规矩,一个模式,要全国推行,不给地方因地制宜之权,必然失败。”(《文集》第59页)强调“自主权”,可以使群众“创造出一些融合各家之长,避开各家之短,即取长补短的办法,要鼓励这种创造。”(《文集》第64页)实现市场与群众的融合,让作为生产者与经营者的农民根据市场变化配置资源。而发展市场经济又需解决流通问题,因为流通渠道多,“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竞争,才能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文集》第39页)1982年,杜老在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我们认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总要有政府干预。”至此,杜老的市场经济思想基本形成,并以此为指导,贯穿市场经济取向的农村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实际上,在1992年之前,“市场经济”一词是忌讳的。但杜老多次提及市场经济,比如1986年在雇工经营问题座谈会上说“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出现各种市场交换,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文集》第281页)也就是说,杜老当时认为中国就是市场经济,这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不同的。他谨慎地说:“我们主张,既搞公有制,又搞市场竞争,这个变化与我们传统的观念、传统的理论是冲突的。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准则如

何统一起来?现在可以讨论,还要研究试验,不要那么着急,一下把办法定死。”(《文集》第448页)他还说,“确定转变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体制。”(《文集》第438页)“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差别竞争,有竞争就有差别。”(《文集》第442页)“用市场价格指挥生产,通过市场来调配资源,是所谓‘市场经济’。”(《文集》第444页)因为“大量价格只能靠市场交换来形成,因为众多商品供求关系靠少数人计算不出来。”(《文集》第235页)杜老认为,市场经济对农村的作用就是分解与转化自然经济,推进分工,优化产业结构,靠市场提出需求,靠市场评价效益,靠市场优胜劣汰。市场经济“不是任何人发明的,它是一种自生自发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商品交换发展程度的经济秩序。市场经济不仅能适应社会分工,通过商品交换,优化资源配置,而且还提供有激励竞争的机制。”(《文集》第852页)但必须保持政府调控,不能实行放任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性是促进两极分化,因此要强调保持社会公平。杜老还指出,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以相容,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在于加快市场发育,要完善各类经济主体的经营体制,发育产品市场,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发展第三产业和城市建设,同时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六)发展战略思想

杜老研究经济问题,既从微观考虑诸如农民问题、中小企业问题,更从宏观探索战略性问题。观点主要有:

1.关于人才战略问题
杜老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期间,就为保护科技人才做了大量工作。复出到“农口”后,他目睹农村工作现状,无论是农村基层,还是决策高层,人才严重匮乏。他说:“现在我国农业的问题很多,而研究农业的人才不多,后继乏人。要赶快加紧培养,不但要有计划地培养,还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才辈出。”(《文集》第30页)他在1981年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小组成立会上就感叹地说,时代需要人才,要在实践中培育人才。杜老不拘一格使用人才,让年轻学者讲真话,做实事,让他们思想和热情有效转化为建设性的具体政策;他们组织和建设起超越利益的研究机构,为改革的“大利益”建言献策。正是杜老的战略眼光,当年这个研究小组的大部分年轻人成为“杜润生徒子徒孙”都走上重要岗位,有的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精英。杜老的人才战略思想和“九号院”实践也为后来我国经济政策研究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为我们认识人才、尊重人才的成功范例。
杜老认为,各行各业都要培养人才,器重人才。专业户是活跃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内涵潜力,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带头人,是农村发展不可或缺的人才力量。山区要引进能工巧匠,培养管理人才。民营企业大部分是集体的管理者,乡镇企业要吸收科技人才,经济管理人才。要重视培养农业人才。搞工程的同时也要“培养一批人才、一支队伍”(《文集》第1437页)。要大办专业技校和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善待人才。政策确定之后,人才决定一切。“谁拥有人才,谁就掌握未来。”(《文集》第1077页)

2.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
杜老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把保护自然环境作为预定前提,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成为下一个发展阶段发展的基础。我国经济发展是以恶化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可以说资源利用是负运行。通过开发新能源,发展水资源节约技术,开发对各类废旧物资和农业排泄物的深度加工综合利用技术,危害为利。从而使国土整治建设更加符合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处、保护自然环境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为我们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可能。“人类的生存不能不靠自然资源,仅仅靠自然资源又不足以满足发展的需要,还要有另外一种资源叫创造性资源,就是要靠人去创造,……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只有知识这个资源是无限的,是无穷的。”(《文集》第1033页)全世界正在进入环境意识自觉时代,可持续发展乃是当代经济发展战略上唯一可行的选择。“我国还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生态弱国,科技后进国。”(《文集》第1379页)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要一心一意谋发展,为可持续发展准备条件。因此要努力创造一个节省土地、节省水资源、节省资本的城市化道路。

3.关于三农战略问题
杜老始终认为,“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问题,它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以及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都是紧密相关的。”(《文集》第931页)因此农业要紧密比较优势的总体战略。同时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改革也可以选择分区突破的发展战略。就农业与工业的发展关系看,“必须妥善选择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的战略,其核心是农业和工业的均衡发展。”(《文集》第449页)从国土发展全局看,“我们一定要把眼睛放在一百亿亩可利用的国土上,搞立体开发,全面开发,念‘山海经’、‘山水经’、念‘草木经’。”(《文集》第142页)当然,进入新世纪,“我们必须适应时代,选择新的战略,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发展轨道,万不可丧失时机。”(《文集》第517页)

(待续)